

著书人语

蓝色呼愁

关于《澳大利亚舅舅》

| 杨方文 |

在键盘上敲下《澳大利亚舅舅》最后一个字，我定了第二天的机票飞回新疆，我先去了一些其他地方，喀纳斯，禾木，布尔津，乌伦古湖。半个月后才回到伊宁。我用一整天时间在六星街闲逛，这是一条蓝色的民族风情街，门窗、墙壁、楼梯、廊檐，从淡蓝浅蓝到深蓝和更蓝。依次递进的蓝，体现了伊宁这座边境小城特有的浪漫和美学。

我在伊宁出生，对一个写作者产生重大影响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在伊宁度过。我在很多篇小说中都写到一条叫羊毛胡同的巷子，读了我小说的人对我说，有一天去伊宁，一定要去羊毛胡同看看。我歉意地告诉他们，没有羊毛胡同，它只是我虚构出来的一条街。我把分散于伊宁的果树，葡萄架，杏花，唱木卡姆的长者，藤蔓上悬挂的柄很长的维吾尔葫芦，散发着玫瑰花香的黄昏，全都集中到了羊毛胡同。还有民居的蓝。

蓝是伊宁的灵晕。我惊讶六星街有我小说里羊毛胡同的颜色。说起来，我是第一次去六星街。一个生长在伊宁的人，第一次去六星街，并不奇怪。我的姐姐，同学，邻居，他们一直生活在伊宁，生活了几十年，他们也一样从来没有去过六星街。他们不需要去，也知道六星街是什么样子。

走在果树浓荫覆盖的街道，我问自己，我看到的，有多少是这个城市的本身？又有多少来自我小说里的虚构？我是在用小说里的视角，回望和怀念这座城市吗？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人们时隔多年后，常常会相信梦中所见确曾发生过。我也犯这样的毛病。我来到一座房子前，发现房子是如此熟悉，搭着葡萄架的院子，一半在阴凉中，一半在阳光下。给人一种一分为二的清晰感，仿佛我的思维一半在虚构的小说里，一半在真实中。土墙边摆放的天竺葵正开着花。浇花的铁皮水壶，是我小说里描写的那种形状，摆放的位置也

跟我小说里一样。葡萄架下的土台子上，坐着聊天、喝茶、抽莫合烟的人。我熟悉他们的语言，熟悉他们的故事和命运走向。我没法分清，他们是坐在我的小说里聊天，喝茶，抽莫合烟，还是坐在真实的六星街？这让我感到无限的困顿，我被自己的小说给困住了。

我曾经是一个写诗歌的人，我写的小说不怎么像小说。写小说的人对我说，中短篇小说文本体量有限，人物不宜太多。这个观点，我心悦诚服地接受，并将之应用到文学经验之外的现实生活中。我朋友不多，常来往的也就那么三两个，符合一个中篇小说对主要人物数量的要求。在《澳大利亚舅舅》中，我让人物一个接一个的出场，八个舅舅，都有写到。众多人物的命运，几十年的光阴，两个大陆板块看似分离又不曾断裂的情感，细密地交织在一起。这种庞杂的构思脉络是对写作经验的挑战。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确信小说拥有一个中心，小说中的每一个词汇、人物、细节、描述，包括转折，都会沿着不同的路径指向这个中心。这个中心像一团光，所有的向前推进，都会自然而然地朝着这个光而去。

2015年的五月我父亲去世，七月我在甘南乱走，我想找到一条通向父亲的路，我不断往海拔更高的地方走，我确信这样可以离父亲更近些。我来到郎木寺，在去天葬台的路上认识了一位姐姐，她癌症晚期，还有一个月好活。我向她说起父亲，她说她可以帮我带话给父亲，等她去了那边，总是会遇见我父亲的，就像在这边遇见我。

动笔写《城南哀歌》的时候是九月，我不知道那位姐姐是否还在人世。写完小说，忍不住大哭一场。其后写的《不会是世界尽头》和《天鹅来到英塔木》，都是《城南哀歌》的延续。包括《苏梅的窗子》。

写《断桥》，已是三年之后。《断桥》写得极其艰难，写完之后，我去断桥跑

了一圈。住在杭州的时候，我会在清晨四五点去西湖跑步，从断桥开始，绕白堤苏堤，经过雷峰塔，再回到断桥，十一公里。

这些年我新疆浙江来回地跑，具有明显差异性的地方空间与南北时间的转换，常常让我有一种恍惚不定的感觉。正是这种恍惚不定，让我产生了巨大的美以及疼痛。我知道自己不论朝哪个方向走，都是走在通往故乡的路上。我对故乡的回归是永恒的，这个故乡可以是心灵里的故乡，也可以是另一个故乡——虚拟又真实的羊毛胡同。我毫不怀疑小说中的人物和我一样都曾真实地存在过。

那个下午，我长时间地站在六星街那座大门半开的房子前，这座房子仿佛不是建筑工人建造出来的，而是我立体地虚构出了它。我站在那里不走开，我在听什么？蓝色的房子？时间？果树里冰凉的流水声？啤酒花淡淡的苦味的芬芳？这个城市的往事？或者是青核桃掉落的声音？帕慕克说，他的伊斯坦布尔，有一种类似呼愁的东西。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某种朦胧状态的情绪，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伊宁也有类似的呼愁。生活在六星街的人，或者是那些生活在我小说中的羊毛胡同里的人，在缓慢的日常生活节奏中，有看得见的快乐与幸福，以及看不见的时光流逝之哀伤，它们构成了伊宁独有的呼愁，构成了我小说的格调。这呼愁不是我一个人的，它隐藏在人流中，隐藏在这个城市的每一条居民街，它飘荡在我的小说里。它是蓝色的。当我转身走出六星街，我感觉我把小说里的人、故事、时间，全部留在了那条街里。包括呼愁。

《澳大利亚舅舅》，杨方 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2022 年 9 月出版，定价：68 元

上架新书

张新颖著
《不任性的灵魂》
上海文艺出版社 59 元



张新颖教授从布罗茨基眼中的奥登、奥登眼中的歌德谈起，牵引出但丁、艾略特、帕斯捷尔纳克、卡佛、博尔赫斯、E.B. 怀特等世界文学史上的响亮人物。天才灵魂的任性飞扬总会显而易见，而作者所看见的，是他们的不任性。

萨鲁·侯健译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谈博尔赫斯》
人民文学出版社 5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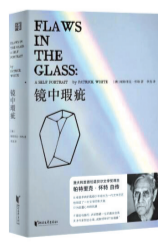
本书是诺奖得主略萨的专题文学评论，系统收录了他在过去 50 年里针对博尔赫斯的访谈与评论文章。略萨在 1963 年第一次采访博尔赫斯，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博尔赫斯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识乐趣”。

田浩江著
《角斗场的图兰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88 元



歌唱家田浩江用生动而富于画面感的笔触，讲述了他职业生涯中有关歌剧的怕与爱。书中既有对帕瓦罗蒂、多明戈、小泽征尔、捷杰耶夫等音乐大师的深入刻画，也有对普通歌剧演员、经纪人、剧院管理者、声乐教练乃至街头艺人等小人物的鲜活描写，堪称一部国际歌剧浮世绘。

浙江文艺出版社 66 元
《镜中瑕疵》
澳帕特里克·怀特著 李尧译



本书是澳大利亚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的文学自传。在这本自传中，怀特毫无保留地剖析自己。他用自己的方式，将澳大利亚和世界描摹、拆解，重新镶嵌在自己心灵的版图之中。

百草园书店提供

品书录

探寻“海上花园城市”身世

读《厦门传》

| 洪忠佩文 |

当我翻开何况、李启宇合著的《厦门传》时，好比一阵海风迎面拂来。“大唐开疆”“人文初兴”“向海而生”“郑氏集团”“通洋正口”“厦门开埠”“鼓浪世界”“厦门升格”“华丽蝶变”等章节，作者引经据典，娓娓道来，引领着我进入到一座“海上花园城市”的秘境，从中打开了厦门的前世今生。

李启宇“研究厦门地方史多年，出版过多部相关专著，对历史与现实的厦门都有独到的见解”，而创作成果颇丰的作家何况，“向来对文史感兴趣，喜欢研究一些传说和故事的细枝末节”，他俩的合作可谓强强联手，在各自的知识谱系中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本书从尘封的历史深处落笔，在考据与叙述中书写厦门历史的延展，视角独特，称得上是一部文学与史学巧妙结合的城市传记佳作。

“花园之城，向海而生”。通读《厦门传》，发现作者在写作本书时抽丝剥茧，除了史料、方志外，诗词、联文、墓志铭都成了文字切入的路径。开篇“大唐

开疆”，就是以“开厦门的第一人”——陈元光的一首《漳州新城宴宴》诗为线索，考证而来。陈元光系“副尉上将军”陈政之子，父亲因病去世后，他承袭父职，肩负泉州、漳州之间的“安危治乱的重任”，诗中所谓的新城即厦门岛。正如作者所言，“厦门岛的历史，进入宋代才像点样子。不过，那时的古厦门岛还称‘嘉禾屿’，只是同安县下属的一个‘里’”。就这样一个小岛，由于考生林槩宋元丰八年（1085）进士及第，从此掀开了新的篇章。虽然，在此后的一百多年，小岛上先后有 6 人金榜题名，但作者认为，真正使“宋代嘉禾屿人文初兴”的，是时任同安县主簿的朱熹。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一味地去引用史料，而是以自己的“阅历”和考证，作出了应有的判断：对署名朱熹《金榜山记》一文，以及署名朱熹《金榜山》诗提出了质疑，表现了扎实的学术见地、秉持的写作态度，还有饱满的艺术才情。

随着嘉禾屿的“人文初兴”，“向海而生”的厦门也浮出了水面。厦门历史

人文底蕴厚重，郑成功“击败荷兰、收复台湾”，清代道光二十三年（1843）“厦门开埠”，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厦门的“华丽蝶变”，迎来“大厦门湾时代”，成为备受瞩目的沿海开放城市，也是“一带一路”重要支点城市，都是本书绕不开的重要节点，作者在重大事件与事件人物之间找到时空关联点，建立起纲目关系。随之交织激荡的，是文字带来的历史人物显影和历史风云变迁。

“厦庇五洲客，门纳万顷涛”，厦门开放包容的城市特质，决定了厦门人追求的精神图谱——厦门不仅是大厦之门，对外开放之门，更是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的海滨城市。所有这些，都是作者在书中力求呈现的。作为阅读体验，本书作者为读者分享了一个多元文化和生态人文景观相互交融的厦门，尤其是作为附录的“厦门大事记”，为读者进一步了解厦门提供了历史索引。

《厦门传》，何况、李启宇 著，外文出版社 2022 年 9 月出版